

救赎与自救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

Salvation and Selfsalvation:

A Study of the Border Service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杨天宏著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Y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杨天宏著

救赎与自救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

Salvation and Selfsalvation:

A Study of the Border Service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杨天宏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0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108 - 03493 - 9

I. ①救… II. ①杨…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中国－
1939～1955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6009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字 数 369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目 录

绪论	001
第1章 社会福音与在华基督教的本色化	013
第一节 社会福音思潮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013
第二节 在华基督教会实现“本色化”的努力	022
第三节 教会事业的区域分布及其存在的问题	035
第2章 抗战军兴与边疆服务运动的酝酿	044
第一节 抗战爆发与国民政府后方建设的政策	044
第二节 “国难”中的中国基督教会	051
第三节 诚静怡与边疆服务运动的酝酿	057
第3章 边疆服务运动的全面展开（1939—1949）	070
第一节 边疆服务的组织建构与经费筹措	070
第二节 抗战期间服务区的开辟与拓展	082
第三节 抗战结束后边疆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	094
第四节 内战期间边疆服务运动的继续	102
第4章 边疆服务与边地社会改良	113
第一节 教育服务与川康地区的文教发展	113
第二节 生计服务与边地社会经济改良	144
第三节 取代传统医巫的医疗卫生服务	158

001

第四节 学生暑期服务团的服务工作	185
第五节 风俗移易与边民吸毒恶习的改变	197
第5章 边民的信仰状况与基督教福音传播	206
第一节 服务区宗教环境及民众信仰状况	209
第二节 川西区福音传播工作的展开	218
第三节 西康区福音工作的开展	227
第四节 医疗卫生服务与基督教福音传播	236
第五节 边部宗教工作的影响与局限	245
第6章 边疆服务运动中的边疆研究	255
第一节 边疆研究的复兴及内涵变化	255
第二节 民族宗教与社会习俗调查研究	267
第三节 边地文化与教育问题研究	276
第四节 边地特殊疾病的调查研究	285
第五节 边地生产与生计问题研究	296
第六节 “边政”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303
第七节 边疆研究的学术贡献与局限	314
第7章 边疆服务的社会认同及变化（1949年以前）	321
第一节 边疆服务面临的内外困境	321
第二节 边疆服务的社会认同及其变化	338
第三节 边疆服务的社会作用与影响	347
第8章 政制转型与边疆服务的终结（1949—1955）	359
第一节 政制转型与基督教会的“三自革新”	362

第二节 边部的时代认知与“自我改造”	375
第三节 各服务区服务工作的艰难继续	408
第四节 政府接管边部工作与边运的终结	415
第9章 结论	425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444
附录二 边部文件	459
索引	472
出版后记	478

Salvation and Selfsalvation : A Study of the Border Service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Contents

Intrsoduction

Chapter 1 Social Gospel and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 1 Social Gospel Theology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 2 Endeavor to Indigenize Christianity**
-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urch Undertakings in China**

Chapter 2 Initiation of Christian Border Service

- 1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cies on Rear-Area Building**
- 2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during the "National Crisis"**
- 3 Dr. Cheng Jing-yi and His Initiation of the Border Service**

Chapter 3 History of Border Service(1939—1949)

- 1 Establishment of the 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rist(BSDC)**
- 2 Opening-Up of the Service Area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 3 Changes of the BSDC 's Work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 4 Continuation of the Border Service during the Civil War**

Chapter 4 Border Service and Social Improvement

- 1 Education Service in the Chuan-Kang Region**
- 2 Border Service and Socio-Economic Improvement**
- 3 Emergence of Modern Medical Services**
- 4 Social Work of "The Student Summer Service Mission"**
- 5 Changes of the Customs in Border Regions**

Chapter 5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 Gospel in Border Regions

- 1 Religious Environment in Service Areas**

- 2**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 Gospel in West Sichuan
- 3**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 Gospel in Xikang
- 4** Evangelism Propagation of Medical Service Work
- 5** Impact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issemination Work

Chapter 6 Border Research Projects by BSDC

- 1** Revival of the Border Research and Its Connotative Changes
- 2** Survey of the Ethnic Religions
- 3**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
- 4** Survey of the Special Diseases in Border Regions
- 5**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in Border Regions
- 6** Research on Border Politics and Ethnic Relations
- 7**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Border Research

Chapter 7 Social Identity of Border Service(before 1949)

- 1** The Dilemma of the Border Service
- 2** Social Identity of the Border Service and Its Change
- 3** Social Function and Effect of the Border Service

Chapter 8 End of Border Service and Transformation(1949—1955)

- 1**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 2** BSDC's Cognition of the Socialism System
- 3** Difficult Continuation of the Border Service
- 4** End of the Border Service

Chapter 9 Conclusion

Appendix 1 References

Appendix 2 Charts of the BSDC Staff and the BSDC's Charter, Plan, etc.

Index

绪 论

基督新教来华迄今已逾两百年。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横跨大西洋到纽约，接着泛槎七月，横渡太平洋，抵达广州，踏上中国这块对基督徒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地。说其陌生，是因为此乃基督新教第一次登陆中国；说其熟悉，是因为在宗教改革、近代基督教产生之前，作为与该教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早期基督教以及教会分裂之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已经在中国有了漫长的实践其“救赎”使命的历史。

基督教对“救赎”的阐释从来意见歧出，为较多教派接受的“救赎论”系11世纪由安瑟伦（Anselm, 1033–1109）提出，后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引申阐释的所谓“补偿说”。认为人类因其始祖的罪孽而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上帝为维护其尊严和社会正义，必须对之进行惩罚。但仁慈的上帝不愿看到人类受罚，而人类自身又无法补偿罪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无罪的人做出牺牲，于是便派自己的独生子基督降世，代人受罚，从而既维护了上帝强调的社会正义，又拯救了人类。其实，人类是否真正具有“原罪”，需要“救赎”，这只是基督教神学或伦理学讨论的问题，世俗学者或不必与之理论，但近代历史上，中国教会人士做出牺牲奉献，参与社会改造事业以“拯救”社会及民众

这一可广义理解为“救赎”的努力，以及可以视为教会“自救”行为的基督教在华发展路向选择及教会对时局变化和国家政制转型的艰难因应，因其涉及教、俗两方面的重要历史，却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在神学理路上由倾向基本教义的“个人福音”向被认为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社会福音”的转变；二是为体现基督教的“普世性”并因应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从“原生”状态向实现在异国他乡的“本土化”或“本色化”的转变；三是从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转向内地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寻求发展。^❶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而言，这是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会几乎所有活动，都与这些变化有关，是其内在义蕴的外化。中华基督教会组织发动的“边疆服务”，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最能同时全面反映这三方面变化的重要事件。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于 1927 年在上海成立，1937 年完成在国民政府的立案手续，成为“国内唯一在中央取得法人资格之基督教会”。^❷从成立到 1949 年国家政制发生重大变化，总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宗教与社会活动。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差会（mission）计有 18 个，所属机构共 21 个大（协）会，直属

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宗派分野，不同教派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取舍差异，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教派不一定认同社会福音，但社会福音一度成为中国教会的主流取向，则应当没有异议。

❷ 沈亚伦著《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称总会成立时间为 1927 年（该文收入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出版社，1999 年，第 541 页）；在诚静怡的追悼会上，张伯怀称总会成立时间是民国 16 年，即 1927 年；秦和平在《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中也称其成立时间为 1927 年。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向四川省社会处“呈请签核备案”，缕述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时，称总会成立于 1926 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社会处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全宗号民 186，目录号 2，案卷号 1835。此处暂从前说。

机构为“两区一部”即云南、贵州两个宣教区和边疆服务部。^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以下简称“边部”）是应抗战建国之需，中华基督教会号召全国青年男女有为之士，到当时称之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的团体。边部创办于1939年冬，结束于1955年10月31日。总部最初设在成都，先后建立了川西、西康和云南三个服务区，主要在川、康、滇三省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受益人数约200万。^②

边疆服务内容广泛，包括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福音传播，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生计服务，以及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服务工作看似琐细，谋求解决的问题却十分宏大，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迫在眉睫的抗战后方建设问题，二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三是历朝历代一直困扰统治者的汉族政权及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化解即“边务”问题。边疆服务历时十六年，前十年遭遇了抗战及国共两党内战的洗礼，后六年恰逢国家政制转型的艰难过渡。在这期间，中国教会竭尽心力，对三方面问题的解决，均谋有所推进，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直属机构，边部的历史堪称总会在政府部门立案之后全部历史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总会乃至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理

^① 这18个差会包括：加拿大合一教会、加拿大合一教会女宣道会、加拿大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女宣道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南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复初会、归正会、同寅会、伦敦会、英浸礼会、英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纽西兰长老会、澳洲长老会、瑞典长老会。见《公报》1949年1月号，转引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调查组编印：《四川省西昌专区基督教教会简史》（内部参考资料），1960年油印本，第9—10页。

^② 边部在解放初期接受调查时所作登记称：“本部现有工作之主要服务对象为川、康两省边界文化落后生活贫苦的少数民族如羌戎番（川西区）及彝族（宁属）等，计人数在二百万之谱。”所说的人数应为直接及间接受益人数之总和。引文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宗教事务处档案：《国际性救济福利团体调查提纲》，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5。

想个案（case）。中华基督教会将其开展的服务工作称为“奉献（或牺牲）服务”（dedicatory service），彰显了边疆服务所具有的“救赎”性质。^①

边部开展服务工作的地域——“边疆”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诠释。根据时人贾湖亭分类，所谓“边疆”有四重含义：即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地理、经济及政治上的边疆，其义甚明，少有分歧。“所谓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如桂之瑶人、滇之夷人、黔之苗人，其距国防线甚远，不能视为地理的边疆，其经济形态，亦多近于粗放农业，亦不能称为经济的边疆，其服膺中央与地方法令甚早，更不能谓为政治的边疆，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故被视为文化的边疆。”因而所谓“文化的边疆”，实即两个以上“不等式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边际（Culture Margin）。^②

吴文藻认为，“边疆”一词“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③李安宅则注意到，就地理而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虽位于“边界”却算不得“边疆”，“而西北南三方的新疆、蒙古、西藏同样到了边界，则又算作边疆，甚至于国土中心如川、甘、青、康的交界藏名安多区者，在四川有松潘、茂县、汶川、理番、懋功之类……也都成

①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Annual Report of the Work of 1945,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Shiao Sih Bah, Kunming. 4–5 (17–19).

② 贾湖亭：《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张其昀主编《边疆论文集》，1966年版，第675页。

③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了边疆”。^①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②

本课题研究的作为边部开展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区域的“边疆”，与李安宅界定的偏重文化意义的“边疆”相类，系特指虽不属于边境地区，却在地理位置和行政管辖范围上距离行政“中心”较远、在文化上与汉文化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有所区别的四川西北、西康及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并非泛指可以划归“边疆”的全部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区域。这些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并不一定处于疆土边界，但因所居民族之语言、文字、宗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均与内地迥异，囿于传统的“文”“野”之分，也就被视为“边疆”了。

边疆服务虽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与文化区域，影响却十分巨大。余牧人在《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一文中指出，边疆服务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③沈亚伦认为，基督教 1911 年至 1950 年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中 1937 年至 1949 年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坚忍”期，认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此时期救护难民、服务伤兵的活动及边部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服务工作，是基督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一项在“艰难中产生的事工，实在是可宝贵的”。^④《中华

^①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 1944 年版，第 1 页。

^②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第 1 卷第 1 期，第 1 页。

^③ 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基督教丛刊》第 9 期，1945 年 2 月，第 9—11 页。

^④ 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 545—546 页。

年鉴》甚至将边疆服务纳入 30 年代在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的范畴，加以肯定。^①

1943 年 10 月，一封涉及边疆服务的信件对边部工作做了如下评价：“基督教的布道合作（Christian Occupational Cooperatives）是当今中国教会最重要的发展变化之一。这项事业是基于如下信念，即如果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则不如让他因饥饿而死去，这样的观念已不合时宜。合作计划是将身体与灵魂的拯救结合在一起，使之能通过基督精神信仰与基督教生活方式的结合而生长。Mrs. Birkel 称，在她待在中国的全部岁月里，她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计划如同边疆服务那样，产生了福音传播的良好效果。”^②

从世界教会史的立场审视，边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耶鲁大学神学院所藏《中国基督教会的新时代》一文，对边疆服务的意义做了如下分析：

促成这一时代进步的机构已经以边疆服务部的组织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些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包含了 20 世纪亚洲国家发展的基本模式。边部现在处于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因为它提供了中国教会所选择的各宗派及国际间合作最早适用原则。此外，鉴于所处之特殊地位，边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堪称独一无二，因为中华基督教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代表了中国五分之三的新教徒，参与指导中国人的共和观念。由于这两层因素，加之面临新的机遇以及为寻求发展而在

① Chi-hsien Chang (张启贤), *Religion*,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0–1941),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ina. p. 89.

②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Archie R. Crouch is Returning to China Mission Field, The Cambrian, Nov. 25, 1943, Box 1 Folder 15. 案：“Christian Occupation”本应直译为“基督教占领”，但也可以翻译成“皈依基督”，如“中华归主”就是这种译法。本书译为“布道”，系采用后一译法而略加变通。

数千里中国边疆拓展时与外部发生的接触，边部在世界教会所承担的使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由于中国在亚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而亚洲拥有世界人口之半，因而中华基督教会的服务计划必将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①

尽管有所溢美，甚至引证的数据也不甚准确，但边疆服务的重要性亦可见一斑。

然而，对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既有学术研究却难餍人望。刘吉西等编写的《四川基督教》是迄今所能检阅到的对边部活动叙述最为完整的著作。该书叙述了边部创建的过程、经费来源、办事处的变迁、三个服务区的设置及具体服务事工、边部开展的研究工作、大学生暑期服务以及边部工作的结束等，并附录有川西、西康两服务区各类服务点一览表、分布图和边部工作人员名单。^②但该书在叙述边部各服务点活动时，内容略显粗疏，大体为孤立记述运动在某一具体时段的状况，缺乏对事物变化的整体性描述。所列图表既没反映出各服务点开办及结束的时间，也没说明各服务点的开办形式，对一些重要服务点的并转情况，也未提供必要的理解线索，甚至连边部工作人员的名单也未能全部囊括。加之涉及边部活动的篇幅仅一万余字，内涵有限，留下诸多缺憾，有待弥补。

秦和平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系对边疆服务作了较为详细阐述的另一要著。该书设置专门章节讨论边部活动，

①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New Age for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Importance of the 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o This Era. Box 2-47, 001. 案：在张伯怀致柯乐智的信函中，张指出：当时中国新教徒的数量为50万人，中华基督教会的成员为16万人，这两个数据都是准确的。但称中华基督教会代表了中国五分之三的新教徒，则明显是计算的错误。参见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W. B. Djang to Archie R. Crouch, August 6, 1947, Box 1-24.

② 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54—474页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

对边疆服务的由来、各服务区的服务工作分别进行叙述，并对边部的宗教活动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但该书也不无缺憾。从根本上言，该书涉及边疆服务的部分仅限于单纯纪事，较少注意问题的探讨。在内容处理上，该书对基督教福音传播及教育服务阐述较为翔实，医疗卫生及生计事业方面则略嫌简略，对1949年以后的边部历史基本没有涉及。此外，该书只记述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至于边部在云南的活动，则只提及在富民和寻甸地区有传教事工，究竟开办了什么服务事业，却未提及，因而难以透过该书窥见边部活动之全貌。

此外，顾卫民、姚民权、罗伟虹、杨学政、韩军学等人的著作以一定篇幅涉及边疆服务。其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认识边疆服务的宏观背景，但因所设论域的限制，对边疆服务的史实语焉不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甚至存在判断差池，参考价值受到影响。^①

就学术论文来看，具有借鉴价值者数量稀少。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一文较为准确地概述了包括边部活动在内的基

① 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设有“外患与内战中的教会”一章，记述了中日战争中基督教在沦陷区的艰难处境。顾氏认为，在大后方的教会事工中，“边疆服务”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因而简要记述了边部的成立缘由、经过、宗旨及下属服务区。但该书只提及边部设立的川西区和西康区，未涉及云南区，此其不完备之一；此外，该书对各服务区的服务事工分类不明确，将医药和教育事工归为一类，对生产事工则未提及，此其不完备之二。有此两点，其不能反映边疆服务活动的整体状况甚明。（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516页。）姚民权、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简史》一书对边部活动也有所反映。该书第七章《外患内战时期的基督教会》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负伤将士服务会”以救护伤兵，后该会“改为了‘边疆服务部’，在云贵地区为内地流亡学生服务”。对边部成立的缘由、经过及服务区域、服务对象等记述均不甚准确，其价值受到影响。（姚民权、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杨学政主编的《云南宗教史》虽提及“中华基督教会”在云南的传教概况，但仅百余字，难以借窥边部在云南的具体活动。（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韩军学著《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一书注意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寻甸苗族地区的传教活动，但仅寥寥数语，基本未涉及边部及边疆服务的史实。（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